

制度与情感

——社会主义现代管理学概要

刘茂才 冯乔云 主编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七五”规划社会科学重点课题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

制度与情感

——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概要

刘茂才 藏书 章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川)新登字015号

四川省七·五计划重点科研项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

制度与情感

——社会主义现代管理学概要

刘茂才 冯乔云 主编

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接时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38千字 印数: 1—1500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616-1698-8 / F · 140 定价: 4.00元

前　　言

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人，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是国家和企事业的主人，既是管理的客体，同时，又是管理的主体。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差别，二者是同一的，其实质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

但同时，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一个有纪律、有秩序的社会。当然，这种纪律不是棍棒式、饥饿式的纪律，而是同志式的、劳动群众自己的纪律。列宁讲：“从苏维埃改革起，从社会主义革命开始起，纪律应该建筑在崭新的基础上，这种纪律就是信任工人和贫农的组织性的纪律，是同志式的纪律，是相互尊重的纪律，是在斗争中发挥独创性和主动性的纪律。”（《列宁全集》第27卷第481页）这种纪律反映在人们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就表现为各种各样必要的、合理的规章制度。

现代化管理十分重视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十分重视从人的情感方面去调动、激发人的积极性。管理者以炽热的情感去感化被管理者，使被管理者产生健康、积极的情感，进而在情感的推动下，充分发挥其潜力，自觉地实现管理目标。在社会主义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二者处于一种同志式的、平等友好的、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管理，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情感管理。

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现象还较为普遍，社会主义劳动纪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和加强。因此，从这种国情出发，既要重视情感管理，也要重视制度管理，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应该是制度与情感相结合的管理。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把《制度与情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管理学》课题组的最终研究专题。该专题的序言由刘茂才同志撰写，绪论、第一、五、六、七、八、九章由冯乔云同志撰写，第二、三、四、十章由陈开明同志撰写，第十一章由李敬同志撰写，第十二章由梁超伦同志撰写，最后由冯乔云同志统编。本书由刘茂才、冯乔云主编，1992年3月决稿。

序言：着眼于第一生产力的解放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刘茂才

《情感与制度》一书，它是社会主义现代管理学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之一，也是继《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研究》一书之后的第二项序列成果。它的重要特点是着眼于人的解放与发展，着眼于如何依靠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一项专著。管理也是生产力的道理，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了，但如何实现有效的管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一复杂而重大的问题，虽然并不是各级管理者陌生的事物，但并不是人们普遍了解的问题，更不是人们会普遍运用的问题。现在和读者见面的这本小册子，就是在复杂的管理系统中，紧紧抓住人的管理这一主题，着眼于人的解放，力求探索一些规律性的问题。特别是抓住人的情感，这确实是一个异常复杂多变而又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做一些规律性的研究，当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

重视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依靠人的情感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重要的问题是尊重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两重发展的规律。人首先是自然物，有来自自然方面的约束，因而就有一个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人作为社会的人，它们又有一个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任务。这就是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两重性决定了人的使命感的两重性。作为自然的人，就要尊重人的生理的、心理的特点，调整人的行为，调动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的积极性。作为社会的人，就要尊重人的社会行为，包括伦理道德行

为、社会制度法规等社会因素，调整和调动人的自由选择和自由创造的积极性，增强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这就是我国正面临着90年代的关键时期，关键的任务就是要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实现国民经济再翻一番进入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而为要实现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要紧的是把国民经济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的又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和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一次战略转移的完成，其深刻性就在于它是共产党人战胜了比敌对政治势力更顽固的自我，否定了一种偏狭的但却是绝对化的价值，其结果是经济作用与利益机制的复苏，从而使“群众”、“个人”、“人民”不再是被“政治”玩弄的术语而真正开始创造历史——哪怕这种“创造”在大多数人那里曾经是“无意识的”。

不管怎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选择——哪怕只是选择当“个体户”，开始“自由地创造”——哪怕只是写“朦胧诗”。如果说第一次战略转移是以“政治”上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为主要特征而体现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刻性的话，那么，第二次战略转移的深刻性则在于中国社会将实现以第一生产力的解放、以人才乃至人的解放与发展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意识的确定。从“政治”到“科技”的嬗递，不是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低位运行，而是形成以人对社会历史进步的结果与条件的自觉选择和自由创造为核心的社会整体优化过程，它当然包括了社会的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法制严明等等。生产力的解放，尤其是第一生产力的解放，其核心就是人的解放，尤其是掌握着并日益创新着现代科学技术——这是全部生产力的内化结晶——的人才的解放，没有高科技的智力解放的发展，就没有第一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种关于“人的解放”的认识，绝不是脱离中国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哲学思考，更不是简单地重复哲学史上的“人道

主义”“人本主义”的苍白说教，它直接就是当前改革的结果，就是中国要跨越本世纪所必需的生产力进步与经济基础的现实要求。这就是说要实现科学技术成果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渗透。为此，就要把握科学技术与社会各个层面上的影响与作用特点，第一个层面是科学技术成果对人类的影响，给当代人塑造一种超人化的自然观、技术系统以及研究自然和社会的方法。第二个层面是科学精神，科技结构和社会结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看待世界方式及价值系统之间的互相影响。实践证明，具体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只是长在有生命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构之树上的果实。科学精神和结构对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影响比具体成果的影响更为重要。一个现代社会，实质上是指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系统受科学广泛冲击并可以容纳科学的社会，也就是以科学理性超民族文化构架的社会。

促进与催化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外部契机，是国际环境的剧变，这一方面体现为国际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动荡与解体，它促使我们对自身制度中的保守因素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而下决心全面改革；另一方面体现为世界科技进步对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与巨大作用。科技进步的作用，往往在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杠杆式的制衡作用，更多的时候，科技力量甚至直接就是政治力量与经济力量。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科技的整体水平到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和产业优势的广度与深度的落后，将直接导致中国在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处于相当被动的局面，因此，中国社会必须也必然要完成、要实现以两次战略大转移为基点的深刻变革。

引动和实施这一社会变革的主体，是中国人，而中国人在这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中也深刻地变革着自己，这是历史变革与进步的另一条主线。一百年来，中国人从皇权与宗法关系的束缚与外族的奴役中逐步挣脱出来，从落后与愚昧中苏醒过来，开始探寻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自我，当全体人民在40多年前为自己的当家

作主欢欣鼓舞后，便一头扎进了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之中，尤其是十年文革的浩劫，使一代人、两代人都变成阶级化、政治化的蝉蜕。当改革初潮涌来时，又有了老、中、青三代人的彷徨、失落、反思、激愤与期待，更有了文凭热、经商热、出国热、“民主”热向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0多年的改革成果的结晶，便是当代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深刻变革，这种“结晶”，形成了三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扎根于亿万人民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意识、商品经济意识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现代意识是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可逆转；亿万人民开拓致富、追求现代化行动不可逆转。正是在这一特定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提出了情感与制度的问题，提出了着眼于人的研究和社会制度与社会行为的研究问题，并且就这方面的规律性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情感与制度的问题，我想这就更加显出了这本书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当然，人的情感和制度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敏感的问题，本书只就这方面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管理思想，立足于国情，特别是从九十年代面临的关键时期、关键任务，着眼于调动人的内心情感，为提供人的自我选择和自由创造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和法规，以便依靠人的创造性行为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以推进我国第二次战略转移的实现；着眼于解放思想、解放第一生产力，实现国民经济再翻一番的战略目标，并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992年3月

目 录

| | |
|--------------------------|--------|
| 前言 | (1) |
| 序言：着眼于第一生产力的解放 | (3) |
| 绪论 管理就是服务 | (1) |
| 第一章 人是首要的生产力 | (6) |
| 第一节 人的自觉能动性 | (6) |
| 第二节 人的因素第一 | (10) |
| 第三节 人是活的、最重要的资源 | (13) |
| 第二章 人的本质及人性理论 | (18) |
| 第一节 人的本质及其特征 | (18) |
| 第二节 几种人性理论 | (20) |
| 第三章 个体与群体 | (24) |
| 第一节 个体 | (24) |
| 第二节 群体 | (27) |
| 第四章 人的主体作用 | (42) |
| 第一节 人的主体作用的过程 | (42) |
| 第二节 影响人的主体作用发展的 发挥的因素 | (44) |
| 第三节 未来的呼唤 | (47) |
| 第五章 需要、动机、行为 | (50) |
| 第一节 需要 | (50) |
| 第二节 动机 | (53) |
| 第三节 行为 | (59) |
| 第六章 情绪、情感、情态 | (69) |
| 第一节 情绪 | (69) |
| 第二节 情感 | (72) |

| | | |
|---------------|-----------------|---------|
| 第三节 | 情态 | (76) |
| 第七章 | 尊重、信任、关心 | (80) |
| 第一节 | 尊重人 | (80) |
| 第二节 | 信任人 | (84) |
| 第三节 | 关心人 | (89) |
| 第八章 | 组织与体制 | (94) |
| 第一节 | 组织与结构 | (94) |
| 第二节 | 体制 | (103) |
| 第九章 | 规章制度 | (117) |
| 第一节 | 规章制度的客观性 | (117) |
| 第二节 | 规章制度的分类与制定 | (126) |
| 第三节 | 规章制度的执行与修订 | (137) |
| 第十章 | 组织文化 | (146) |
| 第一节 | 组织文化的兴起 | (146) |
| 第二节 | 组织文化的内涵 | (148) |
| 第三节 | 组织文化的功能与作用 | (155) |
| 第四节 | 组织文化的类型 | (156) |
| 第五节 | 组织文化的调整与变革 | (159) |
| 第十一章 | 领导与决策 | (165) |
| 第一节 | 领导与领导科学 | (165) |
| 第二节 | 领导者的职责 | (168) |
| 第三节 | 领导即决策 | (171) |
| 第十二章 | 战略型领导者 | (179) |
| 第一节 | 战略型领导者的重要性 | (179) |
| 第二节 | 战略型领导者的素质、特征及作用 | (184) |
| 第三节 | 培养和造就大批战略型领导者 | (189) |
| 主要参考书目 | | (192) |
| 后记 | | (194) |

绪论 管理就是服务

管理是人类社会共同劳动、共同生活的产物，具有二重性。在管理的二重性中，管理的社会属性占着主导的地位，它规定着管理的本质。

早在人类原始社会的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中，就存在着管理活动。在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中，最高管理机构是部落议事会，它是氏族部落全体成年男女享有平等表决权的民主集会。部落议事会的职能在于选举、撤换酋长和军事首领以及其余的信仰守护人；它作为被杀害的氏族成员接受赎金或实行血族复仇的决定；它收养外人加入氏族。部落酋长和军事首领由选举产生，他们是群众的公仆，替群众办事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没有特权，一般也不脱离生产劳动，和部落其他氏族成员之间是一种平等自由的关系。原始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原始社会管理的本质是一种服务。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出现了。于是，“从最初的大规模的社会分工中，产生了社会底最初的大分裂——主人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二大阶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单行本，第115页）原始公社制瓦解了，个体家庭成了社会的经济单位。奴隶主一方面依靠占有的生产资料奴役和剥削奴隶，另一方面摆脱了直接的生产劳动，专门从事管理活动——指挥和监督奴隶劳动。原来氏族或部落的首领，这时成了必要的常设官职：酋长、军事首长、议事会等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职能逐渐独立地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起先的社会公仆逐渐变为社会的主人。“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统治和掠夺国民的”（《马恩选集》第2卷

第335页)。这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规定了管理是统治阶级剥削、奴役被统治阶级的手段和工具。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马恩选集》第1卷第258页)在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资本家手中，资本指挥劳动表明：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不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马克思说：“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资本论》第1卷第367—368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直接生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对立，指挥和监督成了资本家奴役直接生产者的特殊职能。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工人对剥削的反抗必然加剧，因而资本家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其次，随着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最后，雇用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各个工人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外部，存在于资本之中。因而，工人们的劳动的联系，他们自己的统一，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的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

的一一的权力，而同他们相对立。所以，资本主义的管理是二重的，一方面是生产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就其形式来说，资本主义管理是专制的，而且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的特殊形式：资本家刚刚自己摆脱了劳动，现在又把监督和指挥职能交给了有组织的整队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他们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而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雇佣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以生产资料资本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资本主义管理的剥削本质。所以，马克思说：“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资本论》第1卷第369页）

社会主义是对“剥削者的剥夺”，劳动人民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国家的主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的主人翁地位，不仅表现在对一切社会财富的占有和支配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对国家及其一切事业的管理上。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既是管理的客体，更是管理的主体。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就是“由人民自己当自己的家”，巴黎的工人“一举而把所有的职务——军事、行政、政治的职务变成真正工人的职务”（《马恩选集》第4卷114页）。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一再指出，劳动人民能够“当家作主”，“必须使劳动群众独立担负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和建设工作”。毛泽东在《鞍钢宪法批示》中也强调：“人民有权管理上层建筑，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是最根本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114页）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在政治上，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我国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一切国家大事和制定宪法、法律、法令和法规；组织和监督国家以及地方行政、司法、军事机关，检查他们的工作；选举、监督和罢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在经济文化上，人民有参与企业（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等）、事业（包括机关、学校、医院、文化团体、科研机构等）单位管理的民主权利。在社会生活上，人民享受法律规定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管理社会治安、环境及民间其他一切事务的权利。总之，“主权在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事业的主人。

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列宁说：“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在纲领上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群众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列宁选集》第3卷第789页）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的利益，理所当然地要为人民实行管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制度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管理者都是劳动人民中的普通一员，他们手中的指挥、协调等权力是人民给与的，是代表人民群众行使一切权力的，他们必须向人民群众负责并接受人民群众的检查和监督。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者是社会的公仆，必须站在社会公仆的立场上实施管理。“公仆”不是从人身依附关系而是从管理工作的服务性质来讲的。“社会公仆”这是对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适用于一

切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企事业管理干部。

社会主义管理的本质就是服务。管理者作为“社会公仆”，既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护，也应受到人民群众的监督，而且，公仆自己也应该时时监督自己，防止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变成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社会主义管理者，作为社会公仆，应随时想到群众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在管理活动中，要尽一切努力为实现群众利益、国家利益而奋斗；应具有廉洁奉公、忠于职守的优秀品质，经常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为人民群众的民主管理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应模范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的法令法规，力求避免滥用权力，决不为自己谋取不该得的私利。对于党和国家、企事业的干部来说，更要站稳社会公仆的立场履行自己代表人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企事业的职责，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各种不正之风，反对一切腐败行为，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做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管理者。

第一章 人是首要的生产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谈到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资本论》第一卷第202页）列宁在1919年5月《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一文中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选集》第3卷843页）毛泽东在1956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19页）这就是说，在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首要的、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因此，现代管理就是人的管理，其核心是人的潜能的开发和利用。

第一节 人的自觉能动性

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社会的存在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以，人具有二重性：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产物，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现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自然属性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人的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的。

就其人的自然属性来说，不仅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